

Z HONGGUO DANGDAI WENXUE
YISHU ZHUCHAO

中国当代
文学艺术
主潮 ■ 张志忠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为文艺史论著作。它把文学、电影、戏剧、美术、音乐、舞蹈和电视艺术等融汇贯通，阐释推动和制约文学艺术发展的诸种要素，在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的兴替变化、审美态度与艺术传达、情感蕴含与形式积淀、继承借鉴与发展创新的综合考察中，把握当代文学艺术思潮的总体趋向，勾勒当代文学艺术发展之四十余年的动态演进的轮廓。

目 录

导言.....	(1)
民族意识的抑扬与民族审美意识的消长.....	(2)
对艺术的情感方式和艺术表现力的不断拓展.....	(6)
在欢乐与悲怆两极间运动的总体情绪.....	(9)
由封闭走向开放、加入世界文学艺术潮流的进程.....	(15)
完整的表象和具体的再现.....	(20)
第一章 生活喜剧与田园牧歌.....	(25)
解放区文艺方向的确立.....	(25)
喜剧：微笑着向昨天告别.....	(31)
田园牧歌：撷取生活的诗意.....	(46)
第二章 英雄传奇和壮丽史诗.....	(59)
时代的呼唤与历史的激情.....	(59)
宏观地、整体地把握生活.....	(68)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79)
激情与理性的调谐.....	(87)
第三章 赞歌与战歌的交响.....	(93)
为新时代的建设者而讴歌.....	(93)
对生活的思考和咏赞.....	(108)
战歌的兴起及流变.....	(121)
第四章 为了道路的广阔.....	(133)
历史的和心灵的.....	(133)
“写真实”和“干预生活”.....	(140)

人生与自然	(147)
风格与个性	(152)
第五章 人间戏剧与神圣颂歌	(157)
舞台小世界与世界大舞台	(157)
愈演愈烈的冲突	(163)
通体光明的神圣颂歌	(168)
第六章 真实性与悲剧性的复归	(177)
喜泪和悲泪交流	(177)
蜕变的痛苦与艰难的转换	(183)
地火在运行	(186)
血泪的迸发和心灵的解放	(190)
艺术批判思维的确立	(194)
第七章 艺术的开放性和多元化倾向	(201)
闪烁不定的星光	(201)
艺术的传统、革新与开放性	(206)
唯美主义倾向的萌生	(212)
第八章 反思：生活的与艺术的	(220)
思维空间的拓展	(220)
艺术的心灵化与现实主义的深化	(228)
从干预生活到干预心灵	(232)
第九章 理想的崇高与现实的感伤	(236)
变革现实的激情	(236)
冲出峡谷天地宽	(245)
感情的内省和忧伤的美	(25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262)
第十章 面对大自然的凝思	(268)
原野的呼唤	(268)
人与自然之审美关系的重建	(275)

超越与征服	(280)
自然与人生的美和悲	(288)
第十一章 全面贴近和覆盖生活	(295)
从诗意图地看取生活到看取生活的诗意图	(295)
芸芸众生从街道上走来	(300)
平凡的赞歌	(306)
回到事物本身	(314)
第十二章 文化意识的自觉	(322)
“文学有根”与“大河寻源”	(322)
生活之流与文化之根：时间与空间	(328)
文化：多重态度和选择	(335)
得到的和期望的	(340)
第十三章 生命·选择·流浪	(347)
生命的喧哗与骚动	(347)
性之潮的漫流	(353)
理性：选择的迷茫	(360)
悲壮的流浪者	(365)
第十四章 世纪末的瞩望	(375)
分流与综合	(375)
对峙与和解	(380)
建构与消解	(385)
笑比哭好	(389)
文化与市场	(391)
结束语	(394)

导　　言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作家艺术家欢聚一堂，长期以来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民族的解放和文艺的繁荣而奋斗的两支文艺队伍胜利会师。抖落旧生活的灰尘，沐浴新时代的阳光，作家艺术家欣悦地总结既往，瞩望未来，豪情满怀地迎接新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迎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纪，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书写了开卷的一页。

从那时起，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已经走过了它的四十多个年头。四十春秋，有发展，也有挫折，有经验，也有教训，有波澜壮阔，也有不测风云，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成果和更为珍贵的启示。它与当代社会生活同步行，共命运，在潮涨潮落、浮浮沉沉中一直涌进到此时此刻的今天，它是活的文学艺术，它是与我们生活和创造着的当代中国社会息息相通的文学艺术，它是我们每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亲身参与和推进着的文学艺术；也可以说，它的今天和未来，是要靠我们大家去设计去创造的。既然如此，它的艰难行进的足迹，就尤其值得我们高度重视，鉴往而察今，方能使我们在这艺术追求的道路上走得快一些，走得远一些，把文学艺术的接力赛进行得有声有色，气象万千。

民族意识的抑扬 与民族审美意识的消长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与它的反映对象，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社会实践，与它最广大的接受对象，亿万人民大众，都建立了最密切的联系，民族意识的抑扬与民族审美意识的消长，几乎总是同步的曲线运动。

新中国的建立，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亿万人民大众的命运，从鸦片战争以来受尽屈辱和蹂躏的民族，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中，以新的姿态、新的目光，审视着它所面对的世界，无数仁人志士和作为民族情感的承载者和表达者的作家艺术家所为之奋斗，为了梦寐以求的新时代降临了。曾经强烈地诅咒黑暗、寻求光明的作家艺术家，面对焕发了新生命的亿万人民群众，面对他们创造的宏伟业绩，不能不由衷地欢迎它、拥抱它、歌唱它。中国二三十年代以来的革命文学论争和左联时期倡导的表现工厂农村的斗争生活，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及随之提出的文艺大众化问题，直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工农兵方向，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充分地付诸实践的广阔天地。作家艺术家和人民大众的心，从来没有连得这样紧，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从来没有这样“美丽、神奇、丰富”（《美丽·神奇·丰富》是作家徐迟一部散文集的书名）。在诗人眼中，“我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处处看到喷吐珍珠的源泉。/记载下各民族生活的变迁，/它不就是讴歌人民的诗篇？”（闻捷《天山牧歌·序诗》）音乐家则满怀激情地“歌唱祖国”，让庄严而热烈的歌声飞遍全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

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王莘词曲《歌唱祖国》)

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充分关注和尊重，还使作家艺术家深入民间，收集和整理民间文艺作品，从对民间艺人华彦钧的《二泉映月》、《听松》等乐曲的记录和整理，到各地区各民族民歌的推重和传播，从少数民族的舞蹈《热芭》、《摘葡萄》等，到民间叙事诗《阿诗玛》、《嘎达梅林》、《召树屯》、《格萨尔王》，都成为当代文学艺术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自己也在创造生活的同时，创造着美，并进而参与文学艺术的创造，群众性的艺术活动和从他们中间涌现出的作家艺术家，不只是表现出民族意识的高扬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审美意识的觉醒和生长，而且丰富和壮大了当代文学艺术的潮流。从当年欢庆胜利的扭秧歌、舞龙灯，到今天再放光彩的安塞腰鼓、威风锣鼓，从傣族歌手康朗甩，民间诗人王老九、草原上的艺人毛依罕，到唱着东北“二人台”蜚声舞台的赵本山，莫不如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开放，群众性的书法活动、卡拉OK、交谊舞比赛以及收藏热、旅游热、时装热等，用各种积极参与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活动，装点自己的生活，欣赏美的愉悦。

但是，四十余年的历史并不平坦，而是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文学艺术的潮流也如同新中国的历史一样，呈现出一个特殊的曲线——我们把它描述为一个双峰驼背形，即是说，在通常描述的马鞍形的后面，又添加了一段呈下行趋势的线段：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曾经随着新中国的巨大胜利激情和工业建设高潮而形成自己的第一个高峰，以“三红一创”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以《宝莲灯》、《鱼美人》、《小刀会》、《红色娘子军》为代

表的舞蹈艺术，以《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为代表的歌剧艺术，以《开国大典》、《地道战》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为代表的美术，……举凡电影、话剧、音乐各领域，都创造了各自的辉煌，又一齐汇成建国初十七年间的文学艺术主流。

然而，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又始终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并不能不因此受到它的制约。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它对于文学艺术的支配力，一是政治对于文艺方针、路线、政策等等的指导作用；二是历次政治运动往往以文艺论争为其突破口，并且又把文艺界作为政治运动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从毛泽东亲自参与的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及所谓“反党集团”的批判和清算，到后来的“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都不能不影响和限制文艺的进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家全面转入经济建设的五十年代后期以降，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错误倡导，更是严重损害了文艺的生产力，一批批的作家艺术家，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便受到粗暴批判和打入另册，丁玲、艾青、江丰、吴祖光、丁聪、海默等继“胡风集团”的胡风、路翎、鲁藜等人之后落水，他们的蒙难又只不过是十年内乱中大规模地迫害文学艺术家的先河。艺术创作上的种种清规戒律又捆住继续进行艺术创作的人们的手脚，并在十年内乱中规范为“三突出”“高大全”的原则，艺术创作都统一到“样板戏”上来，坠入空前绝后的艺术低谷，满目荒芜之中，生长着几株人工扶植的阴谋文艺的毒苗。

粉碎“四人帮”，天回日转，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报道着文学艺术的第二个春天，它的繁荣和丰富是远远超过建国初期十七年的，中篇小说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成熟，抒情歌曲出现施光南这样的大家，第五代导演的崛起和《老井》、《红高粱》、《香魂女》、《霸王别姬》在国际影坛上夺得金奖，

《海燕》翱翔，《金山战鼓》撼人心魄，《丝路花雨》五彩缤纷，《黄河儿女情》深挚动人，杨丽萍的西南风情舞蹈令人迷醉，电视艺术后来居上，以《红楼梦》、《西游记》、《末代皇帝》、《渴望》、《篱笆·女人·狗》、《瞿秋白》、《编辑部的故事》奠定了它的重要地位，《小井胡同》、《左邻右舍》、《天下第一楼》等剧作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人艺”风格，油画《父亲》、《西藏组画》和壁画艺术的兴起，……真是色彩斑斓，目不暇接。

文学艺术的兴盛和衰落，在四十余年间，都是与政治密切相关，因其意识形态性质而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曾经为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呼雀跃，为国家建设热情讴歌，也曾充当政治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它又为观念的更新、价值的重建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诸领域的除旧布新而呐喊。固然可以说，左倾思潮和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规定性，给文学艺术造成极大伤害；但是，新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又是以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为其先决条件，以其对现实政治的密切关注而产生轰动效应，从“伤痕文艺”、“改革热”到“文化寻根”，都因其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命题的揭示和探索赢得观众和读者。

然而，始料不及的是，作家艺术家们为之呐喊为之先驱的时代变革，在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之后，文学艺术又率先地感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挑战，并由此而陷入另一种窘况：一方面，是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快餐文化的兴盛——一次性消费的畅销书、肥皂剧、轻歌曼舞、波普艺术、流行音乐、纪实文学和武侠、枪战式影片的走红，影视、音乐明星的包装和烘抬；一方面，则是严肃地进行艺术探索和创造的文艺作品和作家艺术家的迷惘——经济生活的活跃和文化消费的丰富，夺去众多的观众和读者，讲效益重实利的社会风气使许多人

放弃或暂时放弃了对形而上的精神文化的追求，出版、制作和演出部门又由于不但不赚钱反而要赔钱而对严肃的文艺作品抱以冷面，移居海外和改行经商，成为部分作家艺术家的现实选择，也削弱了艺术创造的生产力。由此，文学艺术又一次出现低潮。

对艺术的情感方式和艺术 表现力的不断拓展

一时代的文学艺术，作为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时代历程和个人情感的投影和抒写，它总是在寻求对这些内容的准确把握和自身的表现力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总是在寻求切近地勾勒和捕捉时代的审美风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艺术语言和艺术构造，并由此而形成文学艺术潮流的内在推动力，运演出它的动态的过程。

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文学艺术则是这历史宝藏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从三皇五帝的传说，龙凤图腾的崇拜，融诗、舞、乐于一体的《诗经》、《九歌》，到汉唐石刻、宋元绘画、元明清戏曲和小说，艺术精品美不胜收，民族的审美意识决定着艺术创造也决定着艺术欣赏，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之中。只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多灾多难，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决定全民族命运的政治斗争（武装斗争是其最高形式）上，并把文学艺术的审美创造都纳入政治斗争之中，以致在新中国建立、和平生活到来之际，仍然延续了它的惯性运动，直至十年内乱中走入偏狭至极的绝境。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历史的新时期，文学艺术的潮流走出狭谷，转向开阔，道路如扇形般展开，文学艺术的潮流由单向的先后更迭，变为多元的共存共荣，如一位批评家所言，进入一个没有主潮的文艺时代。

由此也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从寻找范式、

建立范式到拒绝和放弃范式、拒绝权威的运动过程。范式理论来自当代著名科学史家库恩，他把科学史的发展演变分为建立范式前的准备和范式建立后的推广衍化以及范式之间的更迭替代。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历程，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寻找、建立和更替种种范式，尽管有过种种挫折和失落，作家艺术家仍然是以巨大的激情去寻求适应于时代的最佳范式的，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迅猛异常的、繁弦急板式的急骤变动，又催促着文学艺术范式的急骤变化。

为了更贴近于艺术的审美本质，我们是从美学形态上来描述这种范式的运动的：它先后经历过生活喜剧与田园牧歌——庄严史诗与英雄传奇——建设赞歌与豪迈战歌——戏剧化冲突的强化与通体光明的神圣赞美诗——艰难蜕变与真实性原则的确立——反思的艺术与艺术的反思——理想的激情与现实的感伤——对自然的凝思——纪实性美学与文化寻根——生命本性的高扬与艺术直觉的崇奉等阶段，如今则进入一个沧海横流、自由表达的散文化时代。万物莫不有对，我们正是力求从艺术辨证法的角度，去揭示当代文学艺术主潮的内在机制和运作的。

不同的美学范式，是作家艺术家熟悉和掌握其不同的艺术表现力的外化和凝形。譬如说，油画艺术就是在表现对象和表现方式上苦苦寻求，而在史诗范式中寻得自己的广阔天地的。从“五四”运动到四十年代末期，中国油画大部分还停止在“人体、风景、静物”习作阶段，描写社会生活而又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创作并不多见，正是在表现宏伟壮丽的革命斗争方面，在描写大规模的群众场面上，得以发挥油画艺术的优长。同样地，正是在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的思潮中，中篇小说异军突起，蔚为壮观，正因为它自身的容量与反思性作品在历史时空与心理时空的迭印上相契合。

美学范式的迅速变换，其动力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变迁和艺术

自身的创新要求，表现出新生的文学艺术的活泼旺盛的生命力。但是，范式的变换过于频繁，使文学艺术失去了必要的从容和休整，每一范式（除了由战歌到“样板戏”）几乎都是初具规模，尚未充分地发展和充分地完善，就被迅速地取代，后来者的命运，却也并不就更幸运一些。在建国后的十七年间，由于政治的强行控制和文学艺术的内在适应机制的作用，文学艺术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采用生存策略，以求作品的可以存在，以求作家艺术家的委曲图存，这对美学范式的幼稚化形成重要的制约作用。进入历史新时期，历史的拨乱反正，时代的开放、改革，使文学艺术得到空前宽松的社会环境，但是，在社会对文学艺术之功能的过分巨大的期待和大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社会心理的浮躁凌厉、喧哗骚动之中，文学艺术也常常在随波逐流，竟为新奇，陷入“运动就是一切”的盲目之中。

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几乎是从一片废墟上起步的，起点非常之低，尤其是在艺术表现方式上：长久地被大动乱大浩劫所压抑、扭曲而又无可倾诉的悲伤和眼泪，如决堤的江水汹涌而出，它不是靠完美的艺术表现，而是以真诚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而感染具有共同遭遇共同感受的人们，例如被作为一种文艺现象之所由得名的短篇小说《伤痕》，它在艺术上的稚拙和它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是根本不成比例的。那一曲歌手台上流泪、听众台下垂涕的《绣金匾》，若非亲身感受，又如何去想象它如此的艺术感染力呢？八十年代，文学艺术的视野逐渐开阔，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外文艺术名作，以及各种哲学、心理学、文化学说的次第引进和评介，爆炸的文学艺术信息和文化信息，不断地给文坛艺苑造成新的刺激、新的兴奋，也给复兴的文学艺术带来相当混乱，象一个调皮的孩子，不断地在增添新玩具的同时丢弃旧玩具，惟新是趋，以至于轰动效应递减，“各领风骚没几天”。创作中的和理论中的“名作”都难以持久，一种范式在刚刚形成之际便被毫不吝惜地

抛弃了。

由于这种追逐新奇的努力，使作家艺术家终将把自己折磨得疲惫不堪，由于这种轰动效应递减使作家艺术家有可能沉下心来思索文学艺术的真谛何在，于是，对某一种占支配地位、具有某种权威性的范式的狂热追求，转化为冷静的思索和稳健的创造，各还命脉各精神，依照各自的禀赋和才力去进行各自的艺术追求，一个面对市场经济大潮而沉吟、选择的文学艺术时代，正在到来。

在欢乐与悲怆两极间 运动的总体情绪

在前面，我们把当代文学艺术的运动轨迹描述为双峰驼背形，从它所传达的社会的内在情绪来说，它是在欢乐与悲怆的两极间运动的，并且由此形成两个波峰，第一个是欢乐，第二个是悲怆；时至今日，则因为情感的丰富，多样及其互生互补，使人们的感情世界趋于开阔、趋于平静。是否可以说，由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东西方文明的撞击和裂变而失去平静、变得倾斜的民族心态，正开始恢复平衡，虽然前路尚遥，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上最动荡的一页已经掀过去了？

自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护送着它的工业文明强行登陆，叩击着中国的封闭自足的古老门坎。一次次以失败和覆灭为结局的对外战争，一纸纸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为内容的中外条约，近现代文明以侵略和强权为先导传入古老的东方，但它的步履维艰和在它的参照下愈发显得原始落后的农业经济的凋蔽更令人沮丧，克虏伯大炮和来复枪武装了中国的士兵，但炮火硝烟、生灵涂炭换来的，却是走马灯似的军阀割据、豪强争霸，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民族灭亡的危机如狂潮迭起，

不得不发出最后的吼声……鲁迅诗云：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其忧愤深广，悲慨凄凉，胜过当年杜工部远矣。斯诺曾经问毛泽东，何以坚定、明快的《国际歌》传入中国，就由四二拍变作四四拍，节奏放慢，旋律悲沉，毛泽东回答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悲哀更多一些。

因此，和新中国同时降生的新中国的文学艺术，便不能不同久经苦难乍获新生的人民群众一道，迸发出强烈的欢乐激情，并以此而贯穿了建国初的十几个年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象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象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从战争和苦难进入和平幸福的时代，人们的欢欣鼓舞用人间语言已经难以表达，于是，自然的隆隆雷声，便把这人间欢歌传遍四面八方。简洁明快、生机勃勃的秧歌舞，从陕北和东北的解放区，一直扭到文化古城北平和现代都市上海，胜利的红绸在舞蹈家手中舞出满天火焰，“明朗的天”作为歌曲唱遍全中国；从那以后，在废墟上竖起的脚手架和井架，在荒滩上出现的绿洲和长河上飞架的桥梁，五年计划的制定，政策法令的公布，农业合作化的热潮和农民学文化的运动，甚至每一次的政治运动和揪出每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都被视作是向着未来胜利的又一个足迹，而激起欢呼阵阵，那世世代代地从事的生产劳动，也因为与

伟大的目标相连接而焕发了新的意义。正如一位诗歌专家所言，“对于苦难太深重、噩梦太多的人，他于‘幸福’极易满足。”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就值得诗人献上唱不尽的颂歌。那时候，人们的思想比现在单纯得多，也纯真得多，他们认为新的生活一开了头，那光明、欢乐、幸福便是永恒的；他们不会想到苦难和黑暗，他们永别了忧伤……一阵欢乐的旋风，掠过清澈见底的溪流，我们窥见了孩子般的天真和狂喜，那种真挚的、噙着泪水的狂喜”（谢冕《历史的沉思》）。欢乐之情弥漫于文学艺术领域，生活喜剧的诙谐风趣，田原牧歌的诗意微笑，壮丽史诗的胜利豪情，豪迈战歌对未来成就的期许，直至十年内乱——十年内乱是一只奇怪的两面兽，它一方面是血腥狰狞，狂暴地毁灭一切，一方面却是酒神式的狂欢，把亿万民众都带入一个用瑰丽而迷幻的色彩编织而成的梦幻之中，如醉如痴，从天安门广场的红色海洋到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大军，从创造“史无前例”的人类壮举到把林彪、江青阴谋集团的覆灭都视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以上海的动乱年月为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疯狂的上海》曾经在结尾处用印度的湿婆神塑像——一位集创造、运动与毁灭于一身，使世界狂转不已的大神的精神比喻十年内乱给人们带来的晕眩和沉醉感；在那对领袖的无以复加的赞颂和依赖之中，人们则获得宗教般的解脱和欢欣。悲剧的另一面是喜剧和狂欢。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初，人们仍然为“第二次解放”而欢呼歌唱。《北京喜讯到边寨》和《祝酒歌》把这种欢乐发挥得淋漓尽致。

是的，十年内乱的终结，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建国之初期，希望的旗帜又一次升起来，各行各业的除旧布新，四个现代化的蓝图离人们更清晰更切近，这一切都似乎令人们感到，只要把在十年内乱中搁浅的航船再纳入建国初期十七年的航道便可以扬帆远航了。

在文学艺术领域，我们也看到了这种短暂的修复旧梦的激情。一方面，新创作的作品，引起我们回顾当年，贺敬之的《十月的胜利》和《八一之歌》使我们想到他的《放声歌唱》，魏巍的《东方》表现出谱写新的壮丽史诗的愿望；音乐的旋律仍旧那样高亢嘹亮地歌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另一方面，则是把从延安时代的《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到六十年代前半期的《东方红》、《蔡文姬》、《洪湖赤卫队》等统统演一遍唱一遍，人们也照样看得入迷听得入迷，不知今夕何夕。

使人们从这种新的胜利的欢乐中清醒过来，并且猛然醒觉到生活的巨大悲剧性的，是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它以冷峻的笔触揭示了一个重要命题：“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四人帮”给人们在精神上造成的遗患和创伤，还远远没有被认识，更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理，谢惠敏那样“左”得可爱的人物还一直得到人们的称道和推崇，而忽略其精神上的巨大戕害。后来的《伤痕》则触及到十年内乱中一个带有相当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即“血统论”对众多的家庭和个人的命运的扭曲。对历史的重新考察和拨乱反正，使人们对生活的悲剧性进一步深化，面对现实中积重难返的淤积，人们也不能不感到软弱无力和由此产生的迷惘。慷慨悲凉的氛围与愤懑的躁动感由此而占据主导的地位。对十年内乱的实质的深刻揭露，使人们普遍产生了被愚弄被出卖的悲怆感，现实生活中的诸种不如意则造成普遍感伤情绪。从《泪痕》到《黄土地》，从《乔厂长上任记》到《爱是不能忘记的》，从《父亲》到《亚当·夏娃的启示》从李谷一那感伤而缠绵、充满幽怨的《乡恋》，到崔健那撕心裂肺般倾诉的《一无所有》，从《报春花》、《血总是热的》到《桑树坪纪事》，都表现出各种层次、各种情境的悲凉之情。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它既融入人们对于历史对于人生的种种感喟，又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绪——一个自我禁锢、自许为“世界革命中心”和“放眼亚非拉”，“解放全人